

金融集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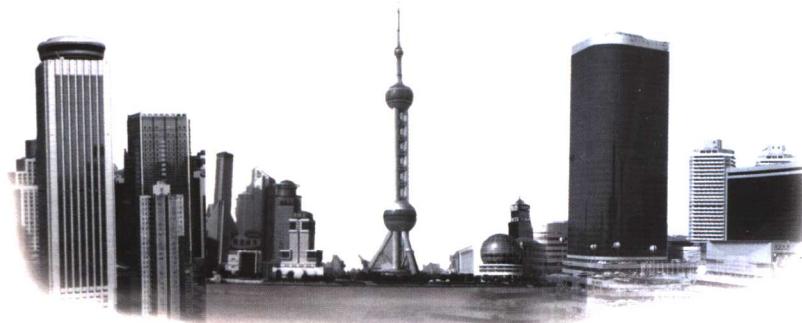
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解析

黄解宇 杨再斌 ◎著

谁更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北京、深圳的金融中心之争

中国到底应该有几个金融中心?
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中心才符合中国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
哪里是建立金融中心的最佳地点?

THE
THEORY OF
FINANCE AGGLOMER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线装书局

金融集聚论

——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解析

黄解宇 杨再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集聚论：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解析/黄解宇，杨再斌著. —北京：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

ISBN 7 - 80106 - 418 - 6

I. 金… II. ①黄…②杨… III. 国际金融 - 金融
机构 - 研究 - 上海市 IV. F832. 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9098 号

责任编辑 杨晓芳

特邀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刘俊

责任印制 王雪梅

封面设计 张新勇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100720)

网 址 <http://www.xzshuju@hotmail.com> <http://www.csspw.cn>

电 话 010 - 84029450(邮购)

排 版 五谷田工作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部联系电话:010 - 64041536

自序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国家发展战略，因为金融中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特别是近几年，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推动下，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加快。伴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各国都更加重视金融中心在本国和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争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也在加剧。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中心的竞争就是经济发展主导权的竞争。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上海建设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在内的四个中心（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目标的重视。

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其国民生产总值2004年达7450亿元，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正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2004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达14%，经济总量超过3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的金融集聚和辐射功能不断增强：一是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成为全国资金、资本市场中心。已初步形成一个由证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产权市场等构成的比较健全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努力将上海打造成全国资产定价中心、市场交易规则形成中心、国内资金集散中心和信息集散中心。二是金融开放力

度逐步加大，成为中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最多的城市。截至2004年底，上海共有各类外资和中外合资金融机构300家，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达2988家。其中，中资银行业当年新增机构36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新增14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新增16家，上汽通用汽车金融公司获准开业，福特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获准筹建。另外，一批商业银行营运中心也落户上海。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达到2.61万亿元，约占全国银行业同期资产的8.3%，比上年同期增长14.6%，高出全国1个百分点。各项存款余额达19994.05亿元，比年初增加2648.68亿元，同比增长15.5%。各项贷款余额达14972.01亿元，比年初增加1966.93亿元，同比增长13.6%。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为495.73亿元，比年初减少296.3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3.96%，比年初下降3.1个百分点。三是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逐步加强，金融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上海金融在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四是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建设为金融中心提供了支撑。2004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455.4万标准箱，居世界第三位；洋山港一期工程将于2005年竣工。口岸进出口总额达到2800多亿美元，占全国的1/4以上^①。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协同推进金融改革与发展。目前，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把浦东作为国家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区，这无疑将极大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

我们对金融集聚问题的研究兴趣开始于2003年我们承担了上海市金融服务办的一个研究课题：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在这个课题中，我们对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

^① 部分参考上海市市长韩正2005年7月13日在北京参加“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展为主要特征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集聚现象有了初步的涉足。我们当时思考的问题是：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深深改变着传统金融业的市场微观结构和格局，因为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金融功能已经克服了地理空间上的限制，能够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地理区域低成本和快捷地实现，不再需要面对面的交易。金融系统自身出于竞争和降低成本的压力，也都在迅速地采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网上银行开始成为传统银行业务新的载体。应该说，网络技术可以有效地帮助银行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然而事实却是：现代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某一城市和区域，而且这些区域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交通和商业中心，由于金融机构的大量集聚，使得这些城市具有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高商务成本，如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等等。这似乎与金融企业降低成本的基本目的相背离。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金融企业业务的特殊性吗？或者是金融企业管理层决策的“羊群行为”？如果是管理层决策的原因，难道现代的公司治理机制完全失效了吗？也许地理因素可以解释部分原因，因为目前世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无不都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几乎都位于世界主要的交通枢纽和航运中心。但是，具有相同地理位置却拥有相对低得多商务成本的地区却为什么不能吸引金融机构的大量集聚呢？是因为金融集聚自身的系统原因吗？也就是说，金融集聚需要其它许多基础性的条件和原因，这些条件和原因无法用成本概念进行度量和概括。当我们把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联系起来时，是不是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发现解决问题的思路呢？

我们当时的思考和疑问促使我们开始金融集聚问题的研究。我们并不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有多艰巨，当我们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时，才发现每走出一步都是对我们已有知识储备和能力的考验。金融集聚问题远非单纯的金融学知识所能解决，我们必须广泛涉猎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学科

的知识，必须学会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对我们的基本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我们的研究是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开始的，力图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追索中发现解决问题的一些线索。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研究上，国内外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意见和看法，在这个问题上，金融地理学的信息流理论是当前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的主流学派。Porteous (1995, 1999)^①、Martin (1999, 2000)^②、Leyshon, A. & Thrift, N. (1994, 1997)^③、Corbridge, Thrift, Martin (1994)^④ 认为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而金融业也可被理解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Porteous (1995) 强调了物理距离是金融交易的影响因素。物理距离近，则信息不对称性所造成的空间效应就小，风险就小；反之，物理距离远，信息不对称性就大，则风险就大。Porteous 认为塑造和发展金融中心的背后力量，大致上可以从“信息外在性”、“信息腹地”、“国际依附性”、“路径依赖”和“不对称信息”来解释。这背后力量是金

① 参考 Porteous, D. J. (1995). *Geography of Finance: Spatial Dimensions of Intermediary Behaviour*, Avebury, Aldershot, England.

Porteous, D. J. (1999).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entres: Location, 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 and Path Dependence.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R. L. Martin, ed.,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② 参考 Martin, R. L. (1999).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f Money.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R. L. Martin, ed.,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Martin, R. L. (2000).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T. Barnes and E. Sheppard, eds., Blackwell, Oxford, 77–94.

③ 参考 Leyshon, A. & Thrift, N. (1997) *Money Space: Geographies of Monetary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Amin A and Thrift N, 1994, Living in the global, in Amin A and Thrift N (Ed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22.

④ 参考 Corbridge, S., Martin, R. & Thrift, N. (1994) *Money, Power and Space*. Oxford: Blackwell.

融中心地位兴衰的决定因素。Gehrig (1998) 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①。Zhao、Smith & Sit 将信息腹地 (information hinterland) 理论应用到金融地理学领域中，并探讨中国金融中心的演化。该研究指出，信息外部性以及不对称信息不仅是塑造信息腹地和决定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地区等级和全球层次的重要因素；在互联网时代，地理因素比以往更重要。Zhao (2002) 认为，非标准信息指当地化的不可以通过惯常媒体传输的信息，如关于公司合并、购并或被接管的小道消息。要想准确解释非标准化信息的内容和价值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准确了解这类信息的广阔背景（或者说文化）^②。韩国经济学家 Pak (1999) 首先将微观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帕克认为集聚经济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因为金融机构的集聚能够有效地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促进各金融机构及各行业信息交流，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网络系统和其它基础设施。规模经济体现在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信息沟通的快捷等。

另有一些学者着重于经济发展、政策环境、地理位置等因素的

① 参考 Gehrig, T. (1998): Cities and the Geography of Financial Centers. In J. Thisse and J - M. Huriot (eds.), *The Economics of C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参考 Zhao, X. B. (2003).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Financial Centr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 Geography of Finance Perspective. *Urban Affairs Review*, 38 (4), 535 – 571.

Zhao, X. B. , Zhang, L. , and Wang, T. (2004) . Determining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e Case of China. *Geoforum*, 35 (4), 577 – 592.

综合作用对不同类型金融中心形成的作用。张凤超、王亚范（2000）认为区域金融成长内含于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之中，为区域金融成长提供条件和空间；同时，区域金融成长的水平和能力也为支持该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张凤超（2005）根据金融产业成长阶段与金融职能特征两个条件，将城市划分为金融支点、金融增长极和金融中心三种金融级别类型，以揭示金融等别城市的空间运动格局。

一些学者用聚集效益与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的理论分析解释金融中心的成因。Kindleberger^①认为，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杨小凯（1991）则构建了一个关于城市化和分工演进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显示，“如果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形成一个城市，那么由于交易时的旅行距离的缩短，交易效率会大大提高，从而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大大提高”。Vernon（1960）认为，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吸引着那些以较快地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公司的核心机构。潘英丽（2003）认为，金融机构的集聚提高了市场流动性，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这种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加速了金融中心的形成。Kindleberger 从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机构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对金融中心形成的促进机理。

在有关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问题上，E. P. Davis（1988）首次将企业选址理论运用到金融中心形成的研究中去。潘英丽（2003）运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① 参考 Kindleberger, C. P. (1974) :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Princeton.

分析了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的影响等。

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和基础，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我们预感到，金融结构的集聚不能简单地应用成本概念进行解释，它与产业集聚、空间的外在性、默示信息在金融信息中的地位有密切关系，金融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包括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效应）是金融机构集聚的直接原因。当一个金融中心已经形成时，它就具有内在的演化逻辑，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这可以从目前世界金融中心聚集的进一步集中化得到证明。

目前金融资源正在向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集中：北美向纽约集中，欧洲向伦敦集中，由于东京国际金融中心自身存在的问题，亚洲国家也在争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2004年8月，阿联酋总统扎耶德颁布总统令，批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正式开业。此前，美国道琼斯公司宣布将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和总部设在迪拜的一家投资银行共同发布“道琼斯—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指数”。中心业务范畴包括资产管理、项目融资、资产评估、银行业务、贷款业务、股票和证券交易、伊斯兰金融、保险和再保险等。中心被认为是一个金融自由区，将有自己特殊的法律和法规，建成后将像伦敦、纽约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一样，具有高透明度和高操作水准以及最先进的监控制度。中心的优惠政策包括允许入驻公司100%独资和拥有房地产权，实行零税收，资金和赢利自由出入等。与此同时，新加坡为了维持自己亚太地区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上海和香港的竞争。如新加坡与香港在开办股指期货产品

上的激烈竞争^①。目前，新加坡现有各类金融机构 600 家，其中，银行 114 家，投资银行 53 家，保险公司 132 家，保险中介公司 60 家，基金管理公司 95 家，证券行 61 家，期货公司 32 家，财务顾问 53 家。其外汇市场是全球第四大市场，平均每日外汇交易额为 1010 亿美元。新加坡是亚洲地区第一个设立金融期货市场的金融中心，拥有先进的金融期货市场，对新加坡的国际风险管理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新加坡还拥有活跃的短期资金市场。新加坡金融业的收入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自 1998 年以来，新加坡就开始着力打造亚洲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由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出台了很多有吸引力的政策，致使香港很多基金经理转到新加坡。新加坡目前的基金管理数量由 1998 年的 870 亿美元上升到 2003 年的 2700 亿美元。而在 1998 年，新加坡的基金管理数量还低于香港的基金管理数量，而目前已经超过了香港。为了培养更多财富管理人才，新加坡去年成立了一所由淡马锡控股的财富管理学院，面向全球招生。

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从税收的优惠、1968 年亚洲美元市场的建立、对证券期货市场的扶持，无不表现出新加坡政府的良苦用心。在现代金融管理制度的建设上，新加坡通过各种方式来完善自己的监管制度体系，如将交易所的会员管理股票交易管理制度改为由政府及银行组织参与

^① 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最早于 1993 年 3 月首度推出香港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但因为这项产品所采用的基础指数存在缺陷，无法反映市场的实际波动，没有引起市场投资者的兴趣，于 1997 年 8 月中止了香港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并于 1998 年 11 月 23 日重新推出了香港指数期货产品，新产品与香港期货交易所的恒指期货有 99.995% 的相关性，且比港股早 15 分钟开市，迟 15 分钟收市，使香港面临极大的竞争压力，迫使香港期货交易所延长了恒指期货的交易时间，并把每张合约的保证金从 8 万港元减至 6 万港元，并于 1999 年 1 月削减所有产品 33% 的保证金要求，豁免了 12 份所有产品的交易费用。香港曾一度阻止路透社向编制指数的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MSCI）提供即时报价，以使新加坡的香港指数期货交易受阻。

管理的管理制度；允许个人用存入中央公积金局的公积金购买黄金、股票等来促进新加坡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新加坡目前已经将公司税由 22% 调低到 20%；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稅收率为 22%；免除来自海外收入所得稅；专利使用费的预扣稅降低到 10%；新公司首 10 万新元应纳税收入将享有三年的免税待遇。对监管机构认可的单位信托基金（Unit Trust）仅需缴纳少量特定的收入稅。国外投资者几乎不用缴稅，个人投资者如果投资的是房地产基金或单位信托基金无须缴稅。对离岸基金享受免税优惠。

新加坡的竞争，迫使香港也积极采取措施维护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如为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减免离岸基金公司的所得稅，对认可的离岸基金公司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其它基金公司则要根据运营模式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基金持有人享受免税的优惠。

香港目前是世界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亚洲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世界第五大外汇交易中心、世界主要的黄金交易市场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2004 年有认可金融机构 208 家（2001 年最高时达 250 家），在这里设行的银行机构数目排在全球前列位置，其中更有 71 家为全球 100 家最大型的银行。在 2004 年 9 月底，香港有 133 家持牌银行、42 家有限制牌照银行及 36 家接受存款公司。这 211 家认可机构合共经营 1295 家本地分行，组成庞大的服务网络。资产总额 7137816 百万港元，其中中国内地 11460 亿港元，日本 5760 亿港元，美国 6500 亿港元，欧洲 18760 亿港元，其它地区 28880 亿港元。客户贷款 21560 亿港元，其中中国内地 4780 亿港元，日本 1310 亿港元，美国 1240 亿港元，欧洲 4200 亿港元，其它地区 10200 亿港元。客户存款 38660 亿港元，其中中国内地 8360 亿港元，日本 1780 亿港元，美国 2910 亿港元，欧洲 5410 亿港元，其它地区 20190 亿港元。可见香港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对外债权 3949504 港元，对外负债 2398474 港元。股本公司市值 6695893

港元，集资总额 281800 港元，新发行债务工具 1708370 港元，未偿还债务总额 6079040 港元。2003 年香港基金公司所管理的资产高达 1.194 万亿港元。根据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报告显示，在香港各类基金公司实际管理的资产比香港证监会统计的数字大很多，达到 3780 亿美元，而新加坡为 2670 亿美元。

即使是世界两大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和伦敦，其竞争态势也日益激烈。目前伦敦已经明显有超越纽约的趋势。根据英国财政部的研究报告，英国目前占跨国银行放款的 19%，高于美国、德国的 10%。英国占全球外国证券成交额的一半以上，美国则是占 26%；英国占外汇交易的 31%，美国占 16%。

在这种竞争态势下，上海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目前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还不是太高，利率、汇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在存在较多政策限制的条件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什么优势和约束条件？应该选择什么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是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或者是人民币产品的创新与交易？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论证。

由于金融集聚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多学科知识的领域，与新兴的空间经济学有密切联系，我们在研究中首次引入了空间的概念。我们从产业聚集、金融自身的流动性、空间的外在性、规模经济、信息不对称及默示信息的作用等诸多方面对金融聚集的基本原因进行了理论研究，我们尽管没有时间完成数学模型的构造（这是下一步研究应该重点完成的工作），但我们基本梳理了对我们当初思考问题的一些理论分析框架，获得了一些清晰的认识。当金融产业跃升为主导产业，金融就会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推动力，金融产业凭借强烈的极化效应引致更大规模的资金流入，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表现出独立运动的特征。在此阶段，金融不仅成为经济的主导与核心，同时也是社会、技术、文化等的信息中心，其整体

功能不断地扩展与提升，独立运作、追求效率、规避风险的产业特征逐渐地凸显，并表现出一定的自组织和自我强化的特征，自身的发展成为自身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成长的条件和动因。这种自我增强特征源于外部经济的正反馈机制。集聚一旦形成，就能通过发挥其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的优势以及区域创新环境弥漫的“产业空气”，既促进区域内新金融机构的衍生，又增强对区域外部金融机构进入的吸引力，从而使集聚的规模不断扩张，优势持续累积，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的自我加强过程。

尽管现代网络技术为金融机构节约成本和进行规模扩张提供很好的载体，特别是对于传统的银行零售业务，网络技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说，金融聚集就是信息的聚集，金融中心本身就是信息最集中的地方，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业也可被理解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但是，网络技术能够进行无差异传输的只是容易编码的标准化信息，其跨空间传递的边际成本成为恒定变量。但那种具有高度语境限制、当地化的不可通过惯常媒体传输的非标准化信息的传播成本却是随距离递增的，并可能因距离而耗损。默示信息本身多是意义含糊、不明确和难以理解的，并且具有广阔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种信息的距离传递具有歧异性和边际成本递增性。要想准确解释默示信息的内涵和价值需要接近于信息源。特别是在金融市场日趋投机和不稳定的今天，要掌握准确信息和市场动向，金融机构必须与该地的社区网络紧密联系。

这无疑都根源于金融业务自身的特征。一是其风险性，需要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规避，它不可能单一服从于成本管理的冲动，承担过高风险的收益在金融业并不理解为最优的选择。二是信息结构对金融业利润来源的影响。金融机构本质上是依靠经营信息赚取利润。在金融集聚区，金融机构的互动能产生大量具有经济利益的

信息，而很多信息的传播具有高速性和低成本性，特别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巨大的“信息外在性”使金融机构的集结能在信息量倍增中获益，产生信息套利活动。当聚集获得的信息收益超过其聚集造成成本增加时，聚集就成为一种必然。况且，聚集也具有内部与外部的规模经济效益，如聚集使行业内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与合作得以开展，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共享基础设施，使一些金融辅助性产业得以发展，如律师、会计、投资咨询、信用评估、资产评估、外语和金融专业技术培训等。同时，聚集也可以通过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促进其它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促进其它产业的发展。

本书是在黄解宇的博士论文与杨再斌的相关研究课题基础上修订而成。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黄解宇负责理论篇以及引论部分的写作与修订，杨再斌则负责战略篇与实证篇的写作与修订。其中黄解宇也承担了战略篇与实证篇的部分工作。由于整部著作结构安排比较宏大，可能远非我们学识与能力所能驾驭。但我们仍期待能够抛砖引玉，使金融集聚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更深层面深入下去。

研究得到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员会委员，金融市场与金融监管专家，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副局长黄运成教授的悉心指导。研究过程中先后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等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得到了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院校众多教授与同行的指导与帮助，得到了来自金融实践第一线的部门，如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上海期交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渤海证券、山西工商银行等机构的专家和朋友的指导和帮助。众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使该书更像

自序

是一本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使该书具有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广泛性和解释力。

黄解宇 杨再斌

2005年7月20日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篇 引论

第一章 绪论.....	3
1.1 金融集聚的内涵.....	3
1.1.1 金融集聚的内涵	3
1.1.2 金融集聚的特点	5
1.1.3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比较	10
1.2 研究意义、内容框架及创新点	11
1.2.1 研究背景	11
1.2.2 理论意义	13
1.2.3 实际应用价值	14
1.2.4 主要研究内容	14
1.2.5 主要创新点	17